

岁月留痕

我家的变迁

孔繁贵

谁都企盼有一个温馨舒适的小家。

耄耋之年的我,生活一天比一天美好,吃穿住无忧,真是幸福生活赛天堂。然而,上世纪60年代我为了能有一个小家,到处奔波,吃尽了苦头。那幕幕情景,像过电影一样,时时浮现在眼前。

我是1961年秋天结婚的,那时,我们俩都住在集体宿舍。1962年夏天,爱人所在工厂撤销,她成了家庭妇女。我在敦化坊村租了一间小平房,面积约10平方米。两人从集体宿舍把铺盖搬到一块,就算有了一个小家。正巧赶上“62压”,回农村的人有的在路边卖锅碗瓢盆,价格非常便宜。我用的那套做饭家具就是在马路边买到的。放衣服没有箱子,只是用包袱皮把衣服包一块儿。后来,我们省吃俭用几个月,花33元钱买回一个扣箱,这下衣服才算有了落脚之地。

“破屋怕遭连阴雨,漏船偏遇顶浪风”。我租的小平房,夏天,遇上下雨,外边天下,里边小下,锅碗瓢盆一齐上阵。一次,我下夜班回了家(当时我爱人回了老家)。外边下着雨,家里到处漏,整个炕上铺的褥子,这儿湿一片,那儿湿一片,就像小孩尿在上面一样。我只能找一块干的地方睡下。可面前还接着一个碗,离枕头不远。刚开始水珠一滴一滴掉在碗里,溅在我脸上,睡不着觉。后来实在困得不行了,不知不觉睡着了。醒来一看,雨水已接了半碗。这房子不能住了,于是我找厂里管房子的领导,最后答应我,允许在招待所暂住一个月。

一个月期满,房产科催我腾房。我正在发愁的

时候,听人说建筑机械修造厂宿舍有空房。到那里一打听,确有其事。我遇到一户好心人家,同情我的处境,将他有的几间房子给我腾出一间,这下解决了我的燃眉之急。那时候,搬家很简单,两块床板,4个长条凳,一个铁火炉,外加一个放衣服的扣箱,一辆小平车就把全部家当搬走了。这间房子面积12平方米,地上没铺砖,纸打的顶棚,夜间老鼠经常顶棚上活动。一次,我上夜班,爱人和儿子在家,半夜里一只大老鼠从顶棚上掉到床上,吓得她用被子包住头,等我回来了,老鼠早跑得没影了。

1976年秋天,我从卧虎山宿舍平房搬进了胜利街3号院简易楼,面积21平方米。家里有自来水,走廊有厕所,很是方便。水泥地面,房子高,通风好,还有个小阳台,比原来的房子宽敞多了。此时,家里有了立柜、双人床、沙发、电视机、收录机、自行车……没过几年,又用上了煤气,既干净又方便,再也不用发愁打煤糕了。

2001年元月,我乔迁新居,住进新盖的楼房,面积70多平方米。家里装修一新,地上铺的瓷砖,有卧室、客厅、卫生间。立柜、沙发、双人床全部换成了新的。前后阳台宽敞。洗衣服用洗衣机,做饭用天然气。热菜热饭有微波炉,烧水用电热壶,要多方便有多方便。比起早年的住房和生活条件,真是天差地别。

我家的变迁,是整个社会的缩影。如今,我已是耄耋之年,能过上这样的好日子,真是太幸福了。

难忘时刻

温被儿

郝妙海

记忆中,儿时的冬天,我们也是有棉衣穿的。不过,那棉衣的里、面,全部打有补丁。而夹层中的棉花,更是不知用了多少年。每年秋天拆洗时,让弹棉花的弹一弹,补加少许新棉花,就又絮了进去。而直到上世纪50年代,村里人根本不知道衬衣为何物,秋衣秋裤连听也没听过。大冬天,最多戴个肚兜,棉衣棉裤就那么贴身穿着,一个冬天都不洗,不换。日子一长,贴身的里子磨得光光的,亮亮的,穿在身上的那股难受劲儿就甭提了。

这样的棉衣裤,白天还好对付。一是孩子们贪玩,在打打闹闹的玩耍游戏中,身子骨会发热,那种不舒服的感觉会暂时淡忘。二是棉衣裤穿上身后,无论是衣暖身,还是身暖衣,时间稍长,也就习惯了。最让人发怵的,是早晨起床后,将胳膊腿伸进袖口裤筒里的时候。因为那时的农家室内,冬天取暖就靠烧炕。而临睡前烧炕带来的一点热气,到后半夜,早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。睡前脱下的棉衣裤,自然与室温一样,早就冰凉刺骨了。因此,衣服上身时,真如同掉进冰窟窿一般。因而,冬日的早晨,如何哄我们兄妹几个起身穿衣,就成了母亲最发愁的一件事。

那时候,为了尽可能充分利用烧炕时产生的那点热量,几乎是在晚饭后点着炕洞内柴禾的同时,母亲便将炕上那简单的被褥铺展好了。这个动作,家乡百姓叫作“温被儿”。到我们嬉戏一会儿准备睡觉时,被子内便已暖烘烘的了,往里钻便不再让人那么发怵了。而睡觉前绝不会忘记一件事,就是将脱下的棉衣裤抖展了,掖到炕脚的褥子底下,以期让它们尽量多地吸收一点炕的余热。然而,一抱柴的热量毕竟有限,大多数日子,早晨起床时的衣裤,掖没掖到褥子底下,其实并无差别。不过,母亲这时就会哄我们:“快起来吧,趁袄儿裤儿还有些热气,要不一煞煞就更凉了!”而我们,尽管十二分的不乐意,却也十二分的没奈何,每天磨蹭一番后,便在母亲的哄骗下咬着牙穿衣下炕了。

一件小事

捡废品捐款

侯振芳

我已经80多岁了,对小时候的事情还记忆犹新。

那是1950年秋末,抗美援朝战争爆发。当时我10岁,在天津的大街小巷,我常常看到一些男女青年背着纸箱子在募捐,上面写着“抗美援朝,保家卫国”“有钱出钱,有力出力”等字,过路人纷纷往里投钱,还有捐衣物和鞋袜的。这些场面一次次促动着我的心。我想,我要是能捐上点钱该多好呀。当时,我家境贫穷,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刚从山东老家逃荒来到天津,家长从来不给我们零花钱。怎么办呢?

当时天津有一个很大的早市,我经常去那里玩,去捡破烂。一天早上,我在那里玩,碰到几个电工在电线杆上干活。我在地上捡了5根半尺长的电线头,还是红铜的,回来后卖了5分钱。当时,5分钱能买5个窝头。走在路上,碰到募捐的人,我赶紧跑过去,把钱放进募捐箱里,心里非常高兴。

古城旧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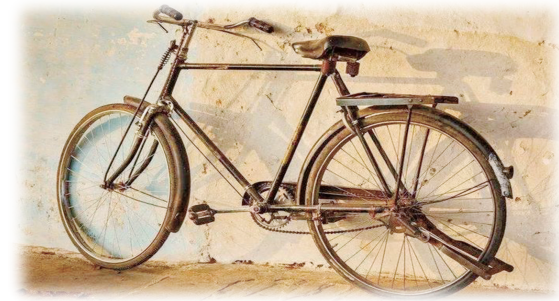
去大中市寄卖东西

张会珍

1970年上中学期间,我心血来潮想拉二胡了,那时候也不知道去拜个师啥的,大人也不管,我就自作主张花了20多元,去买了一把二胡。没过几天,我觉得二胡的钢弦割得手疼,就不想拉了。连个《北风吹》那么简单的曲子也没有学会。

家里放着二胡,看见碍事儿了,就想起拿到大中市寄卖商店卖了吧。从高高的柜台递进去,柜台里的售货员左看右看,问我有证明没有。我一个学生有啥证明呀,那时候也没有学生证啥的,售货员看见问不出个所以然来,就网开一面不问了,然后递过来一张纸,告诉我3个月后来看看能不能卖了,标价16元钱。3个月后来我去看,售货员说卖不了,你拿走吧,还问我要了两元钱的保管费,真是瞎耽误工夫。

父亲买的自行车骑了十几年,车牌撬没了,车座也烂得不行了,爸爸说:你推到大中市卖了吧,卖了旧的再买个新的,单位有个“红旗”自行车号呢。于是在一个星期天的上午,我骑着这个旧自行车直奔大中市,因为只有星期天,大中市才有个旧货交



易市场。

我刚进市场就有个男人过来问我卖多少钱。我没有干过这事儿,我也不懂呀,只好说你看着给吧。那个人说给我10元钱,问我卖不卖,还没有等我说话,旁边的一个人说话了:“你是不是欺负小孩儿不懂呀,那么大的二八加重车子卖废铁也不止10元钱吧?”后来这个人又给加了10元钱,总共20元钱交易成功,条件是我得帮他骑回家。我以为他家就在附近,就答应了。谁知道他家住在东岗路,那么远。我把自行车帮他骑到他家后,还得走回半坡街,手里一共就有卖自行车的20元钱,也不敢坐公交车,怕丢了钱。当时我就感觉到还是卖亏了。可是已经卖了,就啥也不用说了,迈开大步往回走吧。

童年记忆

抓“特务”

王建章

1965年秋我进入大同矿务局一中,不久后的一天下午,班主任武老师在课堂上宣布:“今天咱们班举行一次特殊的中队活动——抓特务,地点在校外不远处,具体怎么抓,到达目的地我再讲。”“抓特务?真新奇!”“哪来的特务啊?”同学们交头接耳、窃窃私语。随后我们跟随老师,排成三路纵队走出校门,东行200米,止步于一片杂草树木丛生的田地旁。

武老师说:“同学们,我说的‘特务’,是事先藏在这块地里的纸条。上面写着‘特务’两字,共100个,大家分头去找,看谁找到的多。时间30分钟,到时我会吹哨子。希望大家抓紧时间。活动现在开始。”话音刚落,同学们四散开来涌入田地。

“抓住了一个!”“我也找到了一个……”欢叫声不绝于耳。可我站在地里左顾右看,三四分钟过去未发现一个“特务”。同学们寻觅到“特务”的地方有的在树上,有的在草丛中,还有的在石头下,我就拨开一处茂密的灌木丛,一张写着“特务”的纸条映入眼帘。接着拨开几处草丛,但无收获。又去搬动石头,搬到第五块时找到第二个“特务”。我又四处寻找,好长时间一无所获。我想这些家伙一定藏得很隐蔽,就去翻一些小石头和砖块,果然找到两

个。随着时间的推移,“特务”越来越难抓,有的同学开始聊天,或四处走窜,而我仍心无旁骛地寻找。功夫不负有心人,后来又在一片残瓦下和树缝中抓获第五个和第六个“特务”。

“同学们,还有5分钟,加油啊!”老师喊到,不少同学又行动起来。“半天也没找见一个,莫非上了天、入了地?”周建喜说到,他的话顿时提醒了我,“特务”上不了天,但能入地!我可见个鼠洞,便疾步走了过去,伸手取出两片树叶,潜伏在洞里的“特务”现了身。转身又把隐藏在土坑里的另一个“特务”擒获。

哨声响起,同学们向老师围了过来。老师要求大家从少到多依次报上抓获“特务”的数量。抓住一个、两个和三个“特务”的同学各有10多人,抓到4个以上的同学越来越少,抓住6个“特务”的只有两人。老师问:“谁抓住了7个?”无人应答。“我宣布,抓‘特务’活动并列冠军的……”“武老师,我抓住了8个!”我赶紧举着纸条走上前去。

老师让我站到队伍前面,把队旗递给了我。随着一声哨响,我双手举着队旗,迈开双腿,与全班54名同学一起,齐声高唱着少先队队歌,踏上了返校之路。